

文学世界



2



上：文學世界作家詩人座談會 1987、12、23

下：台灣名詩人洛夫向明應文學世界邀請訪問香港 1988、1、15





(上) 88亞洲詩人會議台中大會，漢城 金光林、香港卡桑台灣詩人大會主席陳千武

(下) 《金色的珠江》電視詩會(從右至左)：舒婷、傅天琳、張志民、鄒荻帆、韋丘、向明、邵燕祥、白樺、流沙河、野曼、犁青、西彤。



刊前語

隨着《文學世界》《詩世界》的創刊，作家詩人座談會的召開，《文學世界聯誼會》成立了。它引起了世界各地華文文壇的矚目。

一個月來，美洲、亞洲、菲律賓、新加坡、泰國、香港、澳門、台灣及廣州、上海、北京等地的積共三十多家報刊雜誌電台均以發表文章、圖片，或電視廣播等介紹了它。而各國的著名作家、詩人、學者、教授等也主動的參加了《文學世界聯誼會》。目前，這一組織的成員遍及包括美國、加拿大、日本（十三個國家地區。且有外國外族如韓國、日本的教授、詩人）的作家、漢學家亦來參加。相應的《文學世界》的主要成員也參加了香港、台灣、大陸等地的「一連串的文學盛會和活動」。

《文學世界》主編寫的《回歸傳統的台灣現代詩》長文，已由日本著名詩人高橋喜久晴先生請人翻譯為日文，預定在日本雜誌上發表。

《文學世界》於刊登高質量作品的同時，也組織個別國家的華文文學專輯。由於第三屆亞洲華文作家會議將於四月十一至十五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召開，第二期刊登了有關馬來西亞華文文學的專文。同期，亦刊登了世界五十四位作家詩人聯名提

名詩壇泰斗艾青為一九八八年諾貝爾文學獎金獲得者的信件。這封信全面的公正的論述了艾青鉅大的詩學成就和影響。儘管艾青本人對此全不知情。我們發刊此信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替艾青爭奪大獎。而是表達各國的學者詩人的良知和誠摯，及他們對艾青大師的尊敬。諾貝爾評獎會諸公對此如有不同的看法或決定，也完全無損於艾青和中國詩在世界詩愛好者心中的崇高地位。

由於稿擠，本期增加了篇幅六十頁。泰華、菲華、印（尼）華等的文學專輯將於今後陸續組發。而一大組的詩稿已轉推介至香港《當代詩壇》第二期發表。原擬刊出的《劉賓雁傳》亦只得另行作為「增刊」——出版單行本。但，《文學世界》仍然渴誠歡迎來稿。如有長篇或驚世鉅著，也願意專輯或專集出版。

《文學世界聯誼會》亦願意為各地，各國的華文作家、詩人在聯系、交流、訪問或介紹出版作品等方面盡心力。

希望作家詩人們能以在《文學世界》發表作品為樂為榮。希望廣大讀者羣在閱讀《文學世界》的作品時身心愉快和受到教益。

文學世界 第二期目錄

封二

文學世界作家詩人近照

刊前語

目錄

名家研究

上海 巴金：《隨想錄》合訂本新記

四川 譚興國：巴金研究的回顧

上海 巴金：一九六二年巴金爲海外讀者寫的序文

上海 巴金：一九三八年巴金致菲華詩人施穎洲信

名人傳記

愛新覺羅溥儀：末代皇帝溥儀的自白

短篇小說

孔凡仲 杜仁和：張治中先生傳

江蘇 高曉聲：走神

詩情友情

雅加達 茜茜麗亞：狄斯科的眸子

散文世界

萬隆 林萬里：阿龍伯的遺囑

廣州 易征：你來青春就來

文壇盛會

蘇州 霍達：水鄉魂

海峽論壇

北京 劉湛秋：彼岸的鬱金香（二則）

巨星隕落

台灣 李敏勇：異國風景（六則）

香港 卡桑：遊踪履痕（二則）

台灣 張香華：記文學世界作家詩人座談會

台灣 蔣勳：與李澤厚對談《美的歷程》

漢城 許士旭：兩岸詩風的交互現象

上海 杜元明：談柏楊雜文的藝術特色

北京 周明：一座大山倒了 憶念葉聖陶老人

文學研究

作家介紹

長篇連載
城市小說

迷你散文
女性的詩

詩壇泰斗

馬華文壇

詩壇訊息

珠江詩選

香港文學（專輯之一）

四川 文天行：談東北作家在香港創作的小說

香港 李成仔：談翻譯工作者的地位和翻譯獎

廣州 王晉民：施叔青小說集《晚晴》序

蘇州 曹惠民：我看陶然散文

香港 巴 桐：二龍傳奇

香港 張瑞安：她男友的女友

北京 張佳鄰：在啓德機場

香港 宋詒瑞：夜雨沙沙

台灣 苦 苓：香港短鏡頭（九則）

香港 方娥真：水上的名字

亞洲文壇盛會（專輯之二）

世界作家詩人54人：致瑞典皇家學院諾貝爾獎評委會

提名人名單

馬來亞 李錦棠：一九八七年的馬來西亞華文文壇

珠江電視詩會

中國 華夏詩報：詩的盛會

海峽兩岸詩人首次「熱線對話」

北京 張志民：久等了，金色的珠江

北京 鄭荻帆：我想獻一朵花（一首）

北京 邵燕祥：我不是候鳥（一首）

上海 白 樺：紫荊花的天空（二首）

四川 流沙河：南遊紀實

廈門 舒 婷：日落白藤湖

台中盛會

亞洲詩選

詩人對話
詩人論壇

世界聯誼

詩人介紹

成都 傅天琳：音樂噴泉

香港 黎 青：大山與小河（三首）

廣州 韋 丘：珠江第一潮頭（二首）

廣州 野 曼：洗（一首）

廣州 西 彤：珠江，金色的珠江（一首）

廣州 向 明：美陶廠情思（一首）

第三屆亞洲詩人會議

台灣 中央日報：台灣中央日報副刊編者按語

台灣 李魁賢：亞洲詩人會議的脈絡

日本 新川和江：談苦瓜也罷

馬來西亞 德 曼：最後審判日

香港 黎 青：桂林的雲

荷蘭 安·布宜絲：創造

漢城 吳圭源：我們隨地坐下去

詩世界：詩論與詩作一百首（專輯之三）

台灣 洛夫張夢機：回歸傳統 擁抱現代

台灣 向 明：現代詩的回顧和展望

黑龍江 王守義：中國詩走向世界

香港 犁 青：鐵樹開花 致世界詩友

廣州 野 曼：贈海外詩人（五首）

新加坡 劉 海：作家印象記（八首）

北京 曉 鋼：龍之詩（五首）

香港 韓 牧：作家羣象（十七首）

印尼 嚴唯貞：漫步文學世界

福建 劉登翰陳聖言：余光中詩作評介

詩人新作

廣州 楊光治：流淚記下的微笑和含笑記下的悲傷

北京 古繼堂：簡論李魁賢的詩——讀席慕容詩集《七里香》

長沙 李元洛：非馬作品欣賞

北京 雁翼：只要我醒着（三首）

沈陽 阿紅：我傾聽（外三首）

安徽 嚴陣：愛情詩（六首）

北京 陳敬容：關於時間的傳說（二則）

福建 蔡其矯：海神

天津 林希：老妻

台灣 吳明興：瓶插梅（外一首）

台灣 林煥彰：孤獨的時刻（三十二首）

美國 秦松：龍的獨白（外一首）

台灣 陳千武：紅綠燈

新加坡 適民：三十八年

新加坡 石君：祖父的腰包

印尼 明芳：明芳短曲（四首）

《文學世界》《詩世界》介紹

訂閱單

文學世界聯誼會登記表

稿例

亞洲作家詩人合影

封三

《隨想錄》合訂本新記

上海 巴金

(一)

三年前我答應三聯書店在適當的時候出版《隨想錄》的合訂本，當時我是否能完成我的五卷書，自己並沒有信心。說實話，我感到吃力，又好像出了門在半路上，感到進退兩難。我知道老是嘮嘮叨叨，不會討人喜歡，但是有話不說，將骨頭全吞在肚裡化掉，我並無這種本領。經常有一個聲音催促我：「寫吧！我不斷地安慰自己：『試試看。』只要有精神，有力氣，能指揮筆，我就『試試看』，寫寫停停，停停寫寫，終於寫完了最後一篇『隨想』。我擔心見不了天日的第五卷《無題集》也在嘖嘖喳喳的噪音伴送中，穿過荊棘叢生的泥濘小路，進入燈燭輝煌的『文明』書市和讀者見面了。

我做了我可以做的事。我做了我應當做的事。今後呢，五卷書會走它們自己的路，我無能為力了。這大概是我所說的『適當的時候』吧。那麼我答應為合訂本寫的『新記』不能不交卷了。

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一百五十篇長短文全是小人物的喜怒哀樂，自己說是『無力的叫喊』，其實大都是不曾癒合的傷口出來的膿血。我擠出它們不是為了消磨時間，我想減輕自己的痛苦。寫第一篇『隨想』，我拿着筆並不覺得沉重。我在寫作中不斷探索，在探索中逐漸認識自己。為了認識自己才不得不解剖自己。本來想減輕痛苦，以為解剖自己是輕而易舉的事，可是把筆當作手術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我却顯得十分笨拙。我下不了手，因為我感到劇痛。我常說對自己應當嚴格，然而要拿刀刺進我的心窩，我的手軟了。我不敢往深處刺。五卷書上每篇每頁滿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創傷的膿血。我知道不把膿血弄干淨，它就會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僅是我，許多人的傷口都淌着這樣的膿血。我們有共同的遭遇，也有同樣的命運。不用我担心，我沒有做好的事情，別的人會出來完成。解剖自己，我挖得不深，會有人走到我的前頭，不怕痛，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

寫完五卷書我不過開了一個頭。我沉默，但會有更多的作品出現。沒有人願意忘記二十年前開始的大災難，也沒有人甘心再進「牛棚」、接受「深刻的教育」。我們解剖自己，只是爲了弄清「浩劫」的來龍去脈，便于改正錯誤，不再上當受騙。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須先從自己做起，不能把責任完全推給別人，免得將來重犯錯誤。

(二)

怎麼我又講起大道理來了！當初爲香港《大公報》寫稿的時候我並未想到那些事情。我的《隨想錄》是從兩篇談《望鄉》（日本影片）的文章開始的。去年我在家中接待來訪的日本演員栗原小卷，對她說，我看了她和田中絹代主演的《故鄉》，一連寫了兩篇辯護文章，以後就在《大公報》副刊上開辟了《隨想錄》專欄，八年中發表了一百五十篇「隨想」。我還說，要是沒有看到《故鄉》，我可能不會寫出五卷《隨想錄》。其實並非一切都出于偶然，這是獨立思考的必然結果。五十年代我不會寫《隨想錄》，六十年代我寫不出它們。只有在經歷了接連不斷的大小政治運動之後，只有在被剝奪了人權在牛棚裡住了十年之後，我才想起自己是一個「人」，我才明白我也應當像人一樣用自己的腦子思考。真正用自己的腦子去想任何大小事情，一切事物、一切人在我眼前都改換了面貌，我有一種大夢初醒的感覺。只要靜下來，我就想起許多往事，而且用今天的眼光回顧過去，我也很想把自己的思想清理一番。

碰巧影片《望鄉》在京公映，引起一些奇談怪論，中央電視台召開了座談會，我有意見，便寫了文章。朋友潘際炯兄剛剛去香港主編《大公報》副刊《大公園》，他來信向我組稿，又托黃裳來拉稿、催稿。我看見《大公園》上有幾個專欄，便將談《望鄉》的文章寄去，建議爲我開辟一個《隨想錄》專欄。際炯高興地答應了。我最初替《望鄉》講話，只覺得理直氣壯，一吐爲快，並未想到我會給拴在這個專欄上一寫就是八年。從無標題到有標題（頭三十篇中除兩篇外都沒有標題），從無計劃到有計劃，從夢初醒到清醒，從隨想到探索，腦子不再聽別人指揮，獨立思考在發揮作用。拿起筆來，盡管我接觸各種題目，議論各種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終在一個圈子裡打轉，那就是所謂十年浩劫的「文革」，有一個時期提起它我就肅然起敬，高呼「萬歲」！可是通過八年的回憶、分析和解剖，我看清楚了自己，通過自己又多多少少了解周圍的一些人和事，我的筆經常碰到我的傷口。起初我攤開稿紙信筆寫去，遠道寄稿也無非爲了酬答友情。我還有這樣一種想法：發表那些文章也就是御下自己的精神負擔。後來我才逐漸明白，住了十載「牛棚」

我就有責任揭穿那一場驚心動魄的大騙局，不讓子孫後代再遭受難。我邊寫、邊想、邊探索；愈寫下去，愈認真、也愈感痛苦；越往下寫越是覺得筆不肯移動，我時而說筆重數十斤，時而講筆有千斤重，這只是說明作者思想感情的變化。寫《總序》的時候，我並不覺得筆沉重，我也沒有想到用「隨想」作武器進行戰鬥。

我從來不是戰士。而且就在《隨想錄》開始發表的時候，我還在另一本集子的序文中稱「文革」為「偉大的革命」。十多年中在全國報刊上，在人們的口頭上，「偉大的」桂冠總是和「文革」連在一起，我惶恐地高呼萬歲也一直未停。但是在《囑火集》的序裡我已經看出那頂紙糊的桂冠不過是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我的眼睛終於給撥開了，即使是睡眼矇矓，我也看出那個「偉大的」騙局。于是我下了決心：不再說假話！然後又是：要多說真話！開始我還是在保護自己。爲了淨化心靈，不讓內部留下骯髒的東西，我不得不挖掉心上的垃圾，不使它們污染空氣。我沒有想到就這樣我的筆會變成了掃帚，會變成了弓箭，會變成了解剖刀。要清除垃圾，淨化空氣，單對我個人要求嚴格是不夠的，大家都有責任。我們必須弄明白毛病出在哪裡，在我身上，也在別人身上……那麼就挖吧！

在這由衰老到病殘，到手和筆都不聽指揮、寫字十分困難的八年中，「隨想」終於找到箭垛有的放矢了。不能說我的探索 and 追求有多大的收穫，但是我的書一卷接一卷地完成了。我這個病廢的老人居然用「隨想」在荊棘叢中開出了一條小路。我已經看見了面前的那座大樓：「文革博物館」。

(三)

我說過「隨想」是我的「無力的叫喊」。但五卷書却不是我個人的私有物，我也不能爲它們的命運作任何安排。既然它們「無力」，不會引起人們注意或關心，那麼就讓它們自生自滅吧。在我們這樣大的文明古國，幾聲甚至幾十聲間斷的叫喊對任何人的生存都不會有妨礙的。它們多麼微弱，可以說是患病老人的嘆息。

絕沒有想到《隨想錄》在《大公報》上連載不到十幾篇，就有各種各類嘖嘖喳喳傳到我的耳裡。有人揚言我在香港發表文章犯了錯誤；朋友從北京來信說是上海要對我進行批評；還有人在某種場合宣傳我堅持「不同政見」。點名批判對我已非新鮮事情，一聲勒令不會再使我低頭屈膝。我縱然無權無勢，也不會一罵就倒，任人宰割。我反復思考，我想不通，既然說是「百家爭鳴」，爲什麼連老病人有的有氣無力的嘆

息也容忍不了？有此熱人懷着好意勸我盡早擱筆安心養病。我沒有表態。「隨想」繼續發表，內地報刊經常轉載它們，關於我的小道消息也愈傳愈多。仿佛有一個大網迎頭撒下。我已經沒有「脫胎換骨」的機會了，只好站直身子眼睜睜看着網怎樣給收緊。網越收越小，快逼得我無路可走了。我就這樣給逼着用老人無力的叫喊，用病人間斷的嘆息，然後用受難者的血淚建立起我的「文革博物館」來。

爲什麼會有人那麼深切地厭惡我的「隨想錄」？只有在頭一次把「隨想」收集成書的時候，我才明白就因爲我要人們牢牢記住「文革」。第一卷問世不久我便受到圍攻，香港七位大學生在老師的指揮下赤膊上陣，七個人一樣聲調，揮舞棍棒，殺了過來，還說我的「隨想」「文法上不通順」，又缺乏「文學技巧」。不用我苦苦思想，他們的一句話使我開了竅，他們責備我在一本小書內用了四十七處「四人幫」，原來都是爲了「文革」。他們不讓建立「文革博物館」，有的人甚至不許談論「文革」，要大家都忘記在我們國土上發生過的那些事情。

爲什麼內地版的《真話集》中多一篇《鷹的歌》？我寫它只是要自己記住、要別人知道《大公園》上發表的《隨想錄七十二》並非我的原文。有人不征求我的同意就改動它，塗掉一切和「文革」有關的句子。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四十五週年，我引用了先生的名言：「我是一條牛，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和血。」難道是在影射什麼？或者在替誰翻案？爲什麼也犯了忌諱？！

太可怕了！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後，我還不能保衛自己叙說慘痛經歷的權利。十年中間爲了宣傳騙局、推銷謊言，動員了那麼多的人，使用了那麼大的力量，難道今天只要輕輕地一揮手，就可以將十年「浩劫」一筆勾銷？「浩劫」絕不是文學遊戲！將近八十年前，在四川廣元縣衙門二堂「大老爺」審案的景象還不會在我眼前消失，耳邊仿佛還有人高呼，「小民罪該萬死，天王萬世聖明！」

我不相信自己白白地活了八十幾年。我以爲我還在做噩夢。爲了戰勝夢魘，我寫下《鷹的歌》，說明眞話是勾銷不了的。刪改也不會使我沉默。到了我不能保護自己的時候，我就像高爾基所描繪的鷹那樣帶着傷「滾下海去」。

一切照常。一方面是打手們的攻擊和流言飛語的中傷，一方面又是長時期的疾病纏身，我越來越擔心會完不成我的寫作計劃。我又害怕《大公園》主編頂不住那種無形的壓力。爲什麼寫到五卷爲止？我估計我的體力和精力只能支持到那個時候，而且我必須記下的那些事情，一百五十篇「隨想」中也容納得了。我的病情漸漸地惡化，我用靠藥物延續的生命跟那些阻力和夢魘作鬥爭更感到困難。在病房裡我也寫

作，只要手能動，只要紙上現出一筆一劃，我就坐在桌前工作。一天一天、一月一月地過去，書桌上的手稿也逐漸增多。既然有那個專欄，隔一段時間我總得寄去一疊原稿。

我常說加在一起我每天大約有五分之一的時間感到病痛。然而我並未完全失去信心，喪失勇氣，花了八年的工夫我終於完成了五卷書的計劃。

沒有被打倒，沒有給罵死，我的書還在讀者中間流傳。是真是假，是正是邪，讀者將作出公正的判斷。我只說它不是一部普通的書，它會讓人永遠記住那十年中間的許多大小事情。

(四)

可能有人批評我『狂妄自大』，我並不在乎。我在前面說過第一卷書剛剛出版，就讓香港大學生罵得狗血噴頭。我得承認，當時我悶了一天，苦苦思考自己犯了什麼錯誤。我不願在這裡講五卷書在內地的遭遇，爲了讓《隨想錄》接近讀者，我的確花費了不少心血。我不會中途擱筆，因為我一直得到讀者熱情的鼓勵，我的朋友也不是個個『明哲保身』，更多的人給我送來同情和支持。我永遠忘不了他們來信中那些像火、像燈一樣的句子。大多數人的命運牽引着我的心。相信他們，盡我的職責，我不會讓人奪走我的筆。爲什麼不能寫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情？在『文革』的油鍋裡滾了十年，爲什麼不讓寫那個煎骨熬心的大災難？有人告訴我一件事，據說有個西德青年不相信納粹在波蘭建立過滅絕種族的殺人工廠，他以爲那不過是一些人的『幻想』。會有這樣的事！不過四十年的時間，人們就忘記了納粹分子滅絕人性的滔天罪行。我到過奧斯威辛的納粹罪行博物館。毀滅營的遺址還保留在那裡，毒氣室和焚屍爐觸目驚心地出現在我面前。可是已經有人否定它們的存在了！

那麼回過頭來看『文革』，我們到哪裡去尋找它的遺迹？才過去二十年，就有人把這史無前例的『浩劫』看做遙遠的夢，要大家盡早忘記乾淨。我們家的小端端在上初中，她連這樣的『幻想』也沒有，腦子裡有的只是作業和分數，到現在她仍然是我們家最忙的人，每天睡不到八個小時。唯有我不讓人忘記過去慘痛的教訓，談十年的噩夢反反覆復談個不停，幾乎成了一個大逆不道的罪人。

我寫好第一百五十篇『隨想』就聲明『擱筆』，這合訂本的『新記』可能是我的最後一篇文章。我有滿腹的話，不能信手寫去，思前想後我考慮很多。六十年的寫作生活並不使我留戀什麼。和當初一樣我並不爲個人的前途擔心。把自己的一切奉獻出來，雖然只有這麼一點點，我總算『說話算數』，盡了職責。

講出了真話，我可以心安理得地離開人世了。可以說，這五卷書就是用真話建立起來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館」吧。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九日

〈余思牧按〉

巴金先生晚年寫的五集《隨想錄》為三聯書店出版，受到海內外廣大讀者的重視與歡迎。在萬馬齊喑、風向不定、雲霧迷蒙的時局中，巴金先生站出來說真話，對文化革命、文藝路向、文學作用、中西文化交流、教育改革、創作自由、版權保障，以至自我思想言行的剖白、國家民族前途的關懷，和「文革博物館」、「現代文化館」的倡建，無不暢所欲言，表現了他不斷探索，創新、與人民、與讀者憂樂與共的情懷，為中國新文藝的洪流再掀波浪。形成主流。五集《隨想錄》是文革後中國出版的散文集中的巨著，是巴老在健康日益惡化中的力作。它的出版，使中外文藝界看到中國最老一代的新文藝作家，是怎麼地奮發、勇敢、智慧和公正的，是怎麼樣言行一致、老而不衰地起着先驅者的作用，帶領年青一代的新文藝作家起舞、前進。

《文藝報》副主編、《散文世界》編委吳泰昌先生，把巴老為三聯書店出版的「《隨想錄》合訂本新記」一文寄給我，供我修改《巴金年譜簡編》時參考，我覺得把它供《文學世界》發表，讓廣大的讀者能及時地閱讀到它，以了解一個中國文壇老將巴金的摯誠，熱烈的情懷和為國為民、為自由為民主，求真理求進步所作的呼喊，是多麼值得我們尊敬，珍惜和深思的，比之我只個人暫時佔有資料，更有意義。

請記着：巴老燃燒了幾十年的心，是獻給廣大的讀者的，是要跟大家的心貼在一起的。他自始至終，也呼籲中國人民「說真理」、「奮勇前進」、「不要讓十年浩劫再出現」。他說：即使他的心燒成灰，也還在噴火，化成泥土為前進者「暖腳」。大家都來學習巴金先生的好榜樣吧！

（一九八八年四月七日於香港）

巴金研究之回顧

四川 譚興國

巴金不僅是當代中國一位具有世界影響的偉大作家，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非常奇特的文學現象。他長期信仰無政府主義，却以他的作品鼓舞了成千上萬的青年去革命；他的作品在青年中影響之大，國中少見，而他所受的批評之多、之尖刻，國中也少見。

從1928年春，《滅亡》在《小說月報》發表，「巴金」這個名字便引起全國文學界的注意，評論從此開始，爭論也隨之到來。1929——1932巴金創作最多的這二十年，有關他的評論總共不過70篇左右，大多還祇是對某一篇（部）作品的分析，或是對作家的個人印象，說不上系統的、全面的研究。像李健吾談《愛情的三部曲》的文章，巴人《論巴金的〈家〉的三部曲》，趙景深《關於巴金的十封信》等，都保留着同時代人的親切、生動的印象，不乏真知灼見，但總的來說，似乎都沒把巴金作為當代中國一位大作家來看待。應當說，首先認識巴金的是魯迅。魯迅稱巴金是「屈指可數的好作家」，「比別人更認真

「言雖不多却非常中肯。可惜魯迅的看法並未受到魯迅事業的繼承者的重視。巴金這位在讀者中影響最大的作家，却沒有得到文學研究者相應的注意。這不是那個人或那些人的責任，在尖銳的鬥爭環境裏，人們往往根據作家的政治傾向排定座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對巴金的評價和研究大致分成三個時期：十七年（1949——1965）、十年「文革」（1966——1976）、新時期（1977——）。

巴金的命運和祖國人民的命運一樣坎坷不平。十七年發表有關巴金的文章總計近150篇，1958年以前，文章不多，基本上沿着建國前進步文藝界的看法，把他作為共產黨的朋友和革命的同盟軍看待，評價不高，也沒有批判，丁易把三十年代作家分成三類：革命的，進步的，反動的，巴金就和老舍、聞一多、曹禺一道，編入第二類。這是很具有代表性的看法。這個時期，王瑤《論巴金的小說》，首先對巴金小說進行了系統的分折和肯定；思基《談巴金的〈激流三部曲〉》通過對「激流」的肯定確認巴金在新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楊風的《巴金論》，最早提出巴金是「革命民主主義者」而不是無政府主義者的論點，這無疑是在「左」的思潮盛行之下，可能為巴金辯護的最好辦法。

1988年，中國大地刮起一股「浮誇風」，思想文化領域極「左」思潮惡性膨脹，「反右」尚未完全了結，又來「拔白旗，插紅旗」運動，巴金正好碰在了「槍口」上。

這年3月，巴金受人之約寫了一篇《法斯特的悲劇》。文中對美國作家法斯特的「叛黨」表示了惋惜的心情。不久，上海《文匯報》、北京《文藝報》便同時登載「讀者來信」和巴金「商榷」。其中有一位讀者，就是後來「四人幫」在上海的幹將徐景賢。這件事在巴金作了公開解釋和自我批評之後，本已了結，殊不知到了十月，北京的《中國青年》《讀書》《文學知識》《文學研究》等刊物，上海的《文匯報》等報刊，幾乎同時刊登文章對巴金作品進行批評。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在《巴金創作評論》一書的「出版說明」裏明確提出，這是「當前文藝思想領域拔白旗、插紅旗的鬥爭」。在這場持續了一年多的批判運動中，當時在上海《解放日報》當編輯的姚文元，以「青年評論家」的姿態，充當前台指揮，先後發表了《論巴金的小說〈滅亡〉中的無政府主義思想》，《論巴金的小說〈家〉在歷史上的積極作用和它的消極作用》，《分歧的實質在那裏》等文章。這個「連臉部表情都是「正確」的人」，把自己打扮成「馬克思主義的代言人」，定調子、作總結，而「打手」主要是一些年輕無知而又滿腦子僵死教條的大學生。他們脫離具體的歷史環境，違背文藝的基本規律，千方百計在巴金作品和人物身上去找無政府主義

，找小資產階級情調，一旦找到，便大張撻伐，有的甚至連《家》都給與了嚴厲的批判，幾乎否定巴金的全部作品。頗有權威性的人民文學出版社，破例出版了他們的《巴金創作評論》集。

這個時期的批判，雖然和「文革」中的羅織人罪、致人死地的政治判決不同，巴金照樣可以出國訪問，不同的意見也允許發表，但就其思想傾向和批評方法而言，都一脈相承，可以說是「文革」大批判的一場預演，也可看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文革」時期對巴金的批判，從1966年8月開始，到1968年夏天上海全市文化系統「電視鬥爭大會」達到最高潮，以後時斷時續。總共多少「文章」，沒有準確統計，初步翻看一下當時的《解放日報》、《文匯報》和上海作協編的《文學風雷》，以及內部印發的《徹底打倒無產階級專政的死敵巴金》幾個專輯，總有百篇左右。看看文章的題目，就能想象它的內容了：《評彭德懷和巴金的一次反革命勾結》、《解放日報》1967.8.26，〈徹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文匯報》1968.2.26），〈反革命的〈激流三部曲〉〉（《文學風雷》1967.5），〈清算反共老手巴金的滔天罪行〉（《解放日報》1968.6.20），〈批臭巴金，批臭無政府主義〉（《文匯報》1969.8.12）……應當記得這些文章，它們不僅是這場史無前例的文化浩劫的見證，而且時刻告誡我們：文學批評一當脫離正確的軌道，成為整人的工具，將全走到何等荒唐的地方去！

然而，任何偉大的作家，都決不是某個民族的私產。他屬於本民族，也屬於全世界。正是巴金受苦受難的時候，海外對他的研究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研究巴金的第一部專著，是在四十年代末，一個法國學者明興禮（Orl.Monerleto）寫的博士論文《巴金的生活和著作》。1978年5月23日，巴金在給我的一封信中這樣提到這部著作：「托李致帶兩本書給你，是我送給你的。一本是新版的《家》，另一本是一個法國神甫寫的關於我的「生活和著作」的書，1980年出版，不用說是借對我的評傳宣傳天主教。但裏面可能有一點可供參考的材料。」看來巴金在當時並不怎麼同意這本書的某些觀點，但他很珍重這位法國友人的努力。無論如何這是「第一部」，而且，它預見到，即便這個時代過去了，「他的作品如同珍貴的文獻一樣，永遠要被後人保存着」。

十五年之後，香港出版了余思牧先生的《作家巴金》。這部書無論對巴金生平介紹之詳實，還是對作品理解分析深度和準確性，都較明顯地進了一步。這是華人作家寫的第一部巴金研究專著，不僅填補了國人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空白，而且對於國內盛行的極左思潮也是一個有力的反撥。余思牧，廣東開平人